



作家與武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家与武汉

《长江日报》编辑部编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4.5印张 4插图 100,000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0107·328

定价：0.63元

目 录

序.....	荒 煤(1)
我的心仍在武汉.....	姚雪垠(5)
在武汉.....	梁 斌(9)
从“人”字瀑到这里.....	刘 真(14)
西望武汉话当年.....	俞 林(19)
长江奔流.....	碧 野(23)
数十年前	
——1937年秋,我初到武昌,写作《给战斗者》的一夜	
.....	田 间(27)
在坎坷的道路上.....	勤 耕(32)
播撒真理和知识的种子	
——回忆武汉解放后《长江日报》的诞生.....	黎 辛(36)
怀念武汉.....	冯健男(41)
迎接生命中的又一个黎明.....	曾 卓(45)
我的故乡——武汉.....	吴运铎(50)
黎明钟声.....	刘白羽(55)
武汉,美丽的城市.....	田 涛(61)
大雁啊,请捎话给武汉.....	高士其(63)
心海中的歌.....	洪 洋(68)
追根.....	马识途(74)
《蓝色档案》和武汉.....	华永正(79)
往事历历如绘.....	黄秋耘(85)

大江歌潮.....	柯 原(88)
武汉三年常萦怀.....	李满天(92)
怀三镇雄峙的江城.....	秦 牧(95)
武汉抒情.....	吉学沛(99)
汉口学步.....	梁 信(103)
重返故乡.....	金敬迈(106)
回味武汉.....	李尔重(111)
武汉, 走向了新的航道	
——一段回忆.....	邹获帆(117)
武汉一日.....	胡絮青(125)
武汉, 交织着我的爱与恨.....	安 危(129)
武汉, 武汉, 我终于回来了.....	聂华苓(133)
后记.....	郭治澄(136)

序

无 情

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的故乡都怀有一种极其深厚、真挚、热诚的感情；即使多年流落飘泊在异乡，或偶尔途经故乡，或偶尔重返故乡又匆匆离别，或因为某种原因突然联想到故乡的亲友，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青春、初恋、幻想、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希望、斗争的成败……都会产生一种难忘的深沉的眷恋之情，似乎渗透到血液和心灵里的一股热力，使我们感到无法排遣，也很难用语言和文字来加以说明和描述，这或许可以叫做故乡情。任何人都难免有这种故乡情，一个人的诞生和成长，性格的形成，思想感情的变化，发展与成熟，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事业，耕耘的成果，收获的大小……等等，总之，都和故乡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倘若把故乡之情喻为广阔的深不可测、变幻无常的情海，那么，每个人一生的经历，尽管只是故乡情海深处的一些波澜，却常有不可磨灭的时代的烙印；因为故乡情是和人民的生活命运血肉相连，不能分离的。

旧时代、旧社会的故乡的悲惨历史，都是故乡人民的血泪史。

新时代、新社会的故乡的发展历史，都是故乡人民的斗争史。

人民是文艺的母亲，诗人与作家就是人民的儿子，诗和作品是时代的产物，诗人、作家又是感情丰富，对时代最敏感的人物。因此，诗人、作家只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和人民同甘苦、共

命运，就能够真实而深刻地满怀激情地去抒发故乡情。某些优秀作品所以获得成功，也常常渗透着浓郁的故乡情。

也因此，许多作家都还有所谓“第二故乡”，这或者是他的童年、青年时代居住时期较长的地方，或是他青年时代在某个城市正好卷入一个时代的革命漩涡中心，成为他毕生难忘的经历；或者是在某一个地区由于某一个特定的原因，他拿起笔来开始了文学的生涯。……他对这个地区、城市同样怀有一种深厚的故乡情。

所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乡情。但未必每个人都有可能把这种情感通过语言、文字、色彩、音调……给予艺术的再现。有时候，即使通过文学艺术表现出来了，也有种种的因素，未必真能够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所以，真正激动人心的抒发故乡情的作品，是不多的，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千千万万故乡人民所殷切盼望的。

长江日夜奔腾不息地流向大海，谁能计算得出来，在旧中国，它每天把灾难深重中的人民的辛酸、悲凄、痛苦、不幸送走了多少？谁能想得到，滚滚浪涛中有多少人民的血泪？长江历次的大水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悲剧？……

武汉是长江流域的一座重要城镇，曾经是革命的摇篮，革命风暴的中心。例如，辛亥革命，就是在武汉打响第一枪，从而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武汉是震撼全国的中心，尽管大革命失败了，却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的一页。抗战初期，武汉又是全国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大量革命干部的转运站、输送站，全国各地大批文化战士和知识青年，汇集到武汉，又从武汉奔向延安、敌后、大后方……。更不用说，新中国建立以后，武汉人民为了建设一座繁荣昌盛的新武汉，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和代价！

然而应该承认，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武汉革命的斗争史，这种

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艺术所反映的是太少、太少了。这的确是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武汉这个革命摇篮和风暴中心，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期，革命文艺的火焰也从未熄灭过。

今天，这座有相当规模的新兴的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工业城市，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怎么能发扬革命文艺的光荣传统，培养更多的新的作家来反映武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呢？

因此，我十分高兴地赞赏《长江日报》开辟的“作家与武汉”这一个专栏。它不仅唤起作家们对这座城市的怀想，而且从他们热情的回忆中还可以看到武汉的历史面貌。无论是故乡人，还是在武汉生活和战斗过或者是到武汉参观游览过的作家和诗人，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深厚真挚的故乡情谊从何而来，可以使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加深对武汉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未必不是一种生动的形象的教材。

更多的同志拿起笔来写下他在武汉感受最深的一天或一件事的印象，把这些历史的回忆、记录、报导不断地积累和汇合起来，难道不能形成一股震撼人心的浩浩荡荡的长江文艺的新潮流吗？

只有真正懂得武汉的历史，才能真正懂得武汉今天的光荣，也才能真正懂得建设一个更新更美的武汉，对武汉今后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来讲，是多么崇高光荣的责任，也才能真正理解二十年代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后进行血腥屠杀中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烈士们的伟大理想和革命精神！

我作为武汉的故乡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忘却武汉的故乡情。

我在武汉亲耳听到过参加辛亥革命老人的回忆，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城的炮声，随时响起的国际歌和共青团的歌声；亲眼看到遍地红旗飞舞革命高潮中的种种动人的景象，也亲身体验到进

步青年在血腥镇压的白色恐怖中挣扎奋斗的情况，也亲身经历了
一九三一年大水淹了武汉三镇的悲惨遭遇……并且在一九三二年
开始了自己的文学道路。

可惜，也很惭愧，我没有机会从事文学创作，不能把我在武
汉的经历和感受都写出来。

现在，我年已古稀，退居二线，我希望今后尽可能写些回忆录
来酬谢武汉这座城市给我哺育的恩情，为武汉市这个革命丰碑铺
垫一点点沙砾或薄土，抒发一点真挚的故乡情。

因此，作为一个故乡人，也乐意为《长江日报》编辑的《作家
与武汉》留下这篇序言，作为纪念。并且，借此机会，对所有写了
回忆文章，怀念武汉的诗人和作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这就是一个故乡人难忘故乡情的心意。

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凌晨



我的心仍在武汉

姚雪垠

我这一生住过好多地方，但住得最久的是武汉。我在武汉的年月大大超过了我在故乡的年月。武汉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武汉受过教育，得到了锻炼，经了风，见了雨，也在风雨中做出了一点点成绩。如果在我所有的作品后面写上创作地点，武汉和湖北将占有突出地位。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武汉，大概住了不到两个月，又回河南。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既做别的工作，也搞写作。那时做革命工作，生活费和路费都要自己想办法。在武汉时，除写了关于抗战文艺问题的两篇短的论文外，我还写了一本小册子《战地书简》，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白龙港》。既宣传了抗战，也解决了暂时急需的生活费和路费。我还写了一个短篇《差半车麦秸》，写完就寄给茅盾主编的香港的《文艺阵地》了。还没有等到发表，我已经匆匆地离开武汉。这一年我还未满二十八岁。

我在武汉的时候，住在武昌的一所公寓里，名称是“两湖学舍”。解放后，我重访故地，才知道“两湖学舍”在抗战时期已被日本飞机炸成平地。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我曾在襄樊、老河口、均县住过，这些地方与武汉都有关系，毕竟同在湖北。那时我写了一些论文，也写了一些散文，更主要的是写了一个中篇和一个长篇。中篇小说题为《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是《春暖花开的时

候》，这是我青年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小说的前一半是在老河口写的，每天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我带着稿纸跑到城外，向老百姓借把小椅子，自己盘腿坐在地上，将稿纸放在小椅上，低头写作。有时日本飞机成群飞来，俯冲轰炸，扫射机关枪。这时我就爬在地上，听着破碎的弹片在附近发出尖锐的声音。等飞机过去后，我又坐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尘土，伏在小椅上继续写作。不断在轰炸中赶写，在《读书月报》（胡绳主编）上连载。

我第二次来到武汉，已是解放后的一九五三年。这是新的历史时期，我怀着许多理想和希望，想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学事业贡献微末力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的理想迟迟未能实现。直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一个严峻的考验放到我面前：如果一个人真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有着崇高的理想，那么，在受到严重挫折后应该抱什么态度呢？我的回答是把心血倾注在事业上，于是我开始着手写《李自成》。可能是虚构的小说情节感动了自己，也可能是自身的遭遇激励了自己，我常常一面写作，一面哭泣，有时哭得不能不抛下笔来。到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去东西湖农场劳动时，第一卷的初稿已经出来了，第二卷也写出了一部分。虽然稿子很粗糙，但毕竟有了稿子，精神变成了物质，一部分报效祖国的梦想化作了现实存在。以后修改就有基础。我非常感激青年时期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切都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影响终身。倘若没有这种教育，我不可能在一九五七年那样的逆境中继续凭着一个人民作家应有的良心勤奋工作，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之心始终不变，而且毫不怀疑地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处理复杂的历史问题。

在东西湖，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我对单纯通过劳动来改造思想这种方法一直心中怀疑，但东西湖的生活对我确有教育作用。这是又一次锻炼，也是一次考验。在劳动

中我没有忘记《李自成》，总是利用休息时间，继续思考历史问题，也思考艺术细节，并把思考的结果写在日记上。

去年我同一位老同志谈到自己挨整时期的生活和思想，他说：“这就叫作‘家鸡挨打堂前转’。”这是我们河南的一句俗话，意思是我在经受挫折后，好象家鸡一样被打得乱飞，但最后仍在自己家里，不会飞走。我的心总是念念不忘我们的祖国，念念不忘哺育我的党和人民。俗话的下句是：“野鸡不打一翅飞”，但我的心决不会飞走，甚至连一点动摇都没有。

抗战初期我来到武汉时，长江的江面上有外国兵舰，街道乱七八糟，工厂寥寥可数。解放后，我亲眼看到武汉的建设，雄伟的大桥出现在龟蛇两山之间。我曾经登龟山高处远望，一座座的工厂望不到边。我曾经在东湖登长天楼远望，也是一座座新建筑掩映在山与山之间。武汉繁荣了，祖国在前进，这使我感到由衷的欣喜。但是，我也看到，在浮夸风盛行之日，武汉如何受了挫伤。我更看到十年浩劫期间武汉成了什么模样。怎么能够想象，中国的一个大都市，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游行啊，武斗啊，上百辆的大卡车，载着干部、学生、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红缨枪，有的口中含着匕首。看到那种情景，我仿佛又回到了义和拳的时代，红枪会的时代，我感到痛心。

然而这是已经过去了一场噩梦。如今祖国又甦醒了，一面医治创伤，一面大步前进。武汉也甦醒了，也在一面医治创伤，一面大步前进。尽管道路是曲折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扫清，沉浮有时还会从某个角落或某些人的脑海里重新泛起，但历史的洪流是不可阻止的。往年我在武汉，有时经过长江大桥，我总要凭着栏杆凝望好久。我爱长江。长江的雄伟气派使我感动。浩渺的江水，日夜奔腾东去，真是气势磅礴！如今我住在北京，欣赏长江的机会不多了，但我脑海里已经深深留下长江的印象。长江，它不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而且象征着我们的历史，象征着我国人

民的精神。

十年动乱期间，我基本上生活在武汉，只是到一九七五年冬天才来到北京。那个年代，武汉发生的一切，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社会，也重新认识了中国历史。我思考过许多问题，也经历了一个从迷信到理性、从混沌到觉醒的过程。我深切地感到，中国需要补上民主革命这一课。

十年动乱，我也没有忘记将《李自成》继续写下去。虽然写作受了耽误，也受了不应有的误解、批判和攻击，但我没有灰心，没有改变我的创作计划，更没有屈服于“三突出”和“评法批儒”的潮流。

《李自成》第二卷的绝大部分是在武汉写成的。从第一卷到第五卷的整个创作规划和重要情节也是在武汉构思成熟的。我的半生心血，半生事业，同武汉更结下了不解之缘。“四人帮”粉碎后，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对我非常关怀；湖北、武汉的广大读者对我非常关怀。我收到过几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和武汉。党和读者对我的关怀，使我常常怀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心情。尽管我现在搬到了北京，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是湖北和武汉的一个普通作家，我的心没有离开我的第二故乡。可惜的是，我已经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自然的规律使我为人民写作的日子愈来愈少。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不能满足人民对我的要求，辜负了广大读者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至于以后的工作，我所能说的是，我不敢耽误时间，要尽自己的力量抓紧创作，以报答武汉、湖北以及全国读者对我的期望。

在 武 汉

梁 斌

我是北方人，从前我并没有想到去武汉工作。可是后来却到了武汉，武汉三镇可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呀！

如果不南下，也许我不会到武汉去工作。再者，如果不是为了写《红旗谱》这部书，我也不会南下。

要写《红旗谱》这部书，还是在一九三五年，从山东剧院回到北京，和老朋友岳路住在北京西城前英子胡同公寓的时候。当时年轻，创作欲正浓，酝酿的热情挺高，等坐下来，写了几章就凉下来了。寻思了一下原因，一是生活不足，二是没有打过游击战，三是还不能掌握长篇的技巧。于是只有改变计划，写了一个短篇。

第二次写《红旗谱》是在一九四二年。这时创作欲也很高，除了听到的以外，特别到玉田村，拜访了参加高蠡暴动的老同志们，记录了语言 and 材料。可惜的是在战争环境，战斗频繁，静不下来。这次写了一个短篇。直到一九四三年，才又写成一个中篇。虽然如此，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这个题材，永远在我脑子里转着，朱老忠、严知孝、大贵等，这些人物，故事和细节继续在脑子里盘旋着。

自从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四省，到一九三七年，这个时期，成天价东跑西跑，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救亡，争取不当亡国奴。一九三八年开始做剧社工作。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才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不体验则已，一体验农村生活，确实明白了生

活的不足，除写了几个剧本和短篇文章外，所掌握的素材，还不足以写出长篇小说。下决心深入生活，一九四五年，开始到一个县委做宣传部长、副书记的工作。不做实际工作则已，一做起来，每天忙得不行，不是开会就是下乡，一大溜子工作没个完了；先是反奸复仇、反黑地、反国特，后来又是土改试点、土改运动……。

华北的土改运动，我是从博野十二村土改试点开始参加的，直到一九四八年，复查运动完了，想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又发现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这一段时期里，我未做实际工作，生活上是个空白。你说是个空白吧，可也老是在乡村里出溜，在剧社工作，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但只是搞演出工作，没有亲身与工农相结合；这段空白，大概是搞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一溜子群众运动。因此，我要争取南下，到新开辟区工作，从新做起。于是给党委打了报告，由于老同志的帮助，一九四八年随军南下，一九四九年才到了湖北襄阳地委做宣传工作；果然不出所料，一上岗位，第一个中心工作就是剿匪反霸，接着就是减租减息、土改、复查，补上了这一课。

做了一段新区工作，接触了新的人物新的事物，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农村工作十年了，掌握了农民运动的规律，也做上了负责的工作，又不想回到文艺工作岗位了。不巧，土改完了，要抽调干部补充机关。当时党中央要调大批干部进京。

农村工作十年，有了工作经验，掌握了农民运动的规律，懂得了农民，心里有了小打算，就是乐不思蜀了。正好，遇上一件意外的事，中共湖北省委要调动我的工作，到了《新武汉报》（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编者）。（于是我只有离开襄阳地委，搬家到武汉去，住在汉口的招待所里。）组织部告诉我是先念同志调我去的，我找先念同志谈了话，在他家里吃了饭，就走马上任了。

当时觉得，我做这个工作很不相当；这些年里我一直做农村工作，我了解农民，了解农村，比较地熟悉了农民运动的规律。我未做过工人工作，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工厂，不了解城市工作，不懂得工人运动的规律，我的难处就来了，我做不了这个社长兼总编辑。可是市委跟我谈话时，还叫我一人负责，把工作做好。你看，不懂还要负责，有多难呀？

但是，我自十四岁入团，那时也三十多岁了，老干部了，没有说的，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为什么说硬着头皮呢？我南下的目的，不是要到报社当总编辑，是为着写长篇小说《红旗谱》，去补足生活这一课。但是到了目前境地——党的需要，我只有从新学起了。从新学起实在不容易，城市工作是新工作，新闻工作也是一个新工作。

到了报社，和大家见了面，一拿工作，不行，冷手抓热馒头，伸着两只手着难。

《新武汉报》的前身是《大刚报》。编辑部和工厂共有二百人左右，有十几个党员。我是一个新来的人，一个人掌握一个报社、党的喉舌、理论机关，难呀！亏的是其他领导同志来得早一些，比我工作熟悉。此外还有些老新闻工作者，虽然我是新来的吧，到了一块，大家倒挺和谐。

一个人到一个机关，我想一定遇上很多困难。其实不然，这二百人中，没有一个人跟我为难，他们都欢迎我这个年轻的老干部，而且尊重我，工作很顺利。分工的时候，我是“清醒脑筋”的，每天晚上看四大版清样。

我是社长，得参加市委的会议，参加社会活动，参加演讲团，到各机关作学习报告。工作虽然忙，但很好做，因为那时都是一些青年人——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要求我给他们讲“党的工作的四个法宝”，讲“怎样读书”。当时，新参加工作的青年，还不会用马列主义分析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有一次我

讲了怎样读《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天就有一个女同志找我，说她有错误思想。她一说，我就明白了，安慰她说：知道是错误，改了就行了！她还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我劝她多读毛主席的文章，读马列主义。就这样子，工作就做下去了。

武汉天气太热，每年五月开始进入夏季，九月才进入秋季。热度极高，连电扇的风、桌子、床上的席子都是热的。据说武汉是中国三个火盆之一，除武汉外，还有南京和重庆。在武汉，天热的晚上，人们都把竹床搬到马路上睡，不少人在夜晚穿个背心裤衩，脚穿呱哒板，在大街走来走去，这在其他城市是很少见的。

话虽如此，武汉也有适意的地方；夜间看一版清样，摇着扇子到大门外、马路上散散步，有卖馄饨的，卖米酒汤元的，卖莲子汤的，卖热干面的……歇班的夜晚，到长江边上的茶棚下，沏上一杯茶，躺在竹椅上一睡，江风徐来，也怪凉快的。

礼拜的日子里，坐上轮渡过得江去，走上蛇山公园，在黄鹄矶头、松树林中、竹丛之下散步，听听各种的鸟叫，啾啾唧唧。俯视满山的紫玫瑰，长江自西方滚滚而来。龟山全貌，尽在眼前。

紧走慢走，一天出不了汉口。说起来有些夸张。但是汉口有一条三十里长的大街，倒是真情。

谈到生活，武汉是比较讲究的。当时，衣食的样式，比北京还好。武汉的姑娘们长得又白又漂亮；身材适度，工作也很认真负责。靠墙泰的西餐，老通成的炒豆皮，冠生园的饭菜，味道都有特色。谈起风味，吃遍北京、武汉的饭，都不如襄阳的大华饭店，大华饭店的南味，真是有一种特殊的风味。时隔二十五年，又不知大华饭店今日是何光景。

说了一大段吃喝，可不要产生误会，其实，在《新武汉报》的日子里，工作是忙碌的，吃点小吃，只在工作之余。

我是怎样写《红旗谱》的呢？

一九五二年定级，有了工资。一九五三年开始休假，这一年我到北京休假两个月，住在西山碧云寺。休假就是休息。白天游山看景：香山、卧佛寺、周家花园、八大处。晚上睡在床上，轻轻听着松涛，猛地想起一件事，我是文艺工作者下乡来的，来深入生活的，要写文章了。于是开始写《红旗谱》。那时写的《红旗谱》还不是今天的《红旗谱》，是《烽烟图》。没有想到，一下笔特别顺利，好象笔尖上流出来的，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半年写了一部原稿，还修改了几次。

为什么写得这样顺利，我想了一下原因：是生活充实了，有了基础。深入了实际工作，有了工作经验。经过了抗日战争。当过一阵大队的政治委员，没有打过大仗，可是也指挥过小仗，听得多，经历的事多了，见了世面，闯荡了广阔的天地。

时间经过了二十多年，年轻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壮大，都成熟了。现在的《长江日报》，别具风格了，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天虹和曾卓来天津时，谈到武汉，今非昔比；现在有了长江大桥，有了武汉钢铁公司，成了一个工业基地。

